

23

集	文	四
粹	史	川
第四卷 文化教育科学编	资	
	料	



四川文史资料集粹

●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四卷

文化教育科学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成都

目 录

文 学 艺 术

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	翁植耘 (3)
学兼中西、文风独创的文学家李劫人	伍加伦 (22)
我在抗战后方琐忆	沙 汀 (38)
在抗敌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见闻	洪 钟 (57)
《沁园春》咏雪词在重庆传诵期间材料补遗	尹 凌 (64)
父亲张大千的画业	萧建初 张心瑞 (78)
深入民间的画家——蒋兆和	屈义林 (86)
雕塑生活漫忆(摘录)	刘开渠 (93)
早期木刻运动在四川	鄧中铁 (101)
成都老招牌与名人书法	唐觉从 (109)
音乐学家王光祈	江仁忻 (116)
丰采多姿的青川民歌	文超胜 (126)
忆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	戴碧湘 (140)
陪都戏剧春秋(六则)	张瑞芳 秦怡 董亚军等 (155)
川剧作家黄吉安	席明真 (169)
戏德戏艺长留风范的康子林	谭韶华 (181)
成都早期话剧活动	周芷颖 高思伯 (186)
回忆谐剧的产生	王永梭 (198)
成都讲“圣谕”回忆	石友山 方崇实 (205)

忆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 陈兰荪 (222)

新 闻 出 版

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 孙少荊 (237)

卞小吾与《重庆日报》 卞稚珊 (250)

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蜀报 周钦岳 (258)

回忆《华西日报》 赵星洲 (276)

对《回忆〈华西日报〉》一文的几点质疑 陈雁翬 (290)

回忆《西方日报》的战斗过程 陈 落 (295)

成都《工商导报》解放前的战斗历程

..... 安新贤 张西洛等 (304)

杰出的新闻记者范长江 黄剑庆 (318)

回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 刘克俊 (334)

清末成都书肆一瞥 傅樵村 (357)

清代成都木刻书业和省外书商的发展 刘东父 (361)

致力于藏书、校讎、出版、献书社会的名宿傅增湘

..... 李国俊 (366)

陈岳安与“华阳书报流通处” 丁既明 (374)

皖南事变前后的重庆生活书店 仲秋元 (379)

教 育

清末民间儿童读物 张秀熟 (395)

私塾回忆 李铁夫 (406)

存古学堂嬗变记 何域凡 (417)

四川高等学堂纪略 陆殿舆 (429)

复性书院与马一浮先生 丁敬涵 (440)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黄里州	(453)
抗战时期迁川的国立中央大学	郑体思 陆云荪	(503)
抗战时期内迁的复旦大学	罗文锦	(520)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江安	肖能芳	(532)
在抗战激流中前进的四川大学	陈光复 张明	(544)
抗战时期的华西协合大学	王光媛	(562)
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大学	伍子玉	(580)
富于革命精神的重庆女子师范学校	丁秀君	(593)
泸州川南师范史话	何伯李	(611)
吴照华与树德中学	廖清华	(620)
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记要	陈成达 赵雅为	(625)
和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日子	汪刃锋	(633)
回忆重庆社会大学	杨乔	(644)
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文化名人张秀熟	罗明莹 钟利戡	(651)

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

经学大师廖平	李伏伽 廖幼平	(665)
记谢无量先生	王云凡	(674)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豹隐	刘方健	(680)
经史学家蒙文通	李有明	(687)
为学术、教育毕生尽瘁的徐中舒	吴天墀	(701)
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	林向	(719)
著名经济学家彭迪先	王筑	(728)
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中央研究院	张凤琦	(734)
战时的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	黄立人	(752)
卢作孚与中国西部科学院	朱珠	(765)

四川农业科技推广情况	梁禹九	谢呈源	(775)
四川省蚕桑改良场概略	杨耀健		(785)
宝兴大熊猫面世记	胡大可		(794)
中国地质学界的宗师——黄汲清	黄立人		(807)
一代通才的科学家周太玄	周孟璞	周仲璧	刘恩义 (826)
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	许光瓚		(835)
最早向中国传播相对论的魏时珍	范敬一		(841)
攀西宝库叩门人——常隆庆	邵元拯		(855)

文学艺术



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 及其创作活动

翁植耘*

郭沫若在抗战7年多时间内，除1940年因探父病、奔父丧两次回故乡乐山约两个多月，及1945年6月9日至同年8月20日访问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纪念活动外，没有离开过重庆。照他自己的话说，“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牢笼中，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但就在这闭塞沉闷的环境中，郭沫若接受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的劝告和帮助，先后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官方身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掀起了抗日救亡宣传的高潮，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激烈斗争，极大地活跃和推动了大后方的学术研究。他自己还写出了很多震撼人心的史剧、诗歌和杂文，以及后来成为学术界丰碑的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的巨著……这些是他一生中创作和研究的第二个高潮（第一个是创造社时期）。郭沫若的不朽史剧《屈原》和《虎符》都只用10天的功夫写成（1942年1月和2月的2日—11日）；《孔雀胆》只用6天（1942年9月3日至8日），其速度是惊人的。而且在这些日子中，他除了写作外，还有许多社会活

* 作者本名翁泽水，抗战期间（1938年12月—1945年8月）曾任郭沫若的秘书。现任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委。

动。比如在创作《屈原》的10天中，他还作过4次演讲；且每天照常会客，平均每天要会见10个人；还照常替别人看稿、改稿（用一天功夫看完石凌鹤的《山城夜曲》）；另外，他照常到外面应酬，参加苏联大使馆的茶会等等。所以他的实际写作时间每天不到4小时。这一方面说明他具有充沛精力和绝世才华；同时也说明他在重庆短短7年多的时间里，是怎样紧张而又繁忙地战斗着的。

一、出掌第三厅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三厅和文工会自始至终在中共方面的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厅内和会内设立秘密的中共特支，特支书记为冯乃超。第三厅1938年4月1日成立于武昌昙华林，集合了大批革命的进步文化工作者，有著名的政治家、国际问题专家、科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史学家、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和演员，人才荟萃，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威震武汉三镇，影响波及全国和世界……。1938年10月武汉弃守后，第三厅组织起来的宣传团队，除孩子剧团外，所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以及漫画宣传队、4个电影放映队，均已分赴全国各战区的前线和敌后开展工作；厅本部还有一二百工作人员，辗转经长沙、衡山、桂林，于1938年底到达重庆。那时国民党为箝制第三厅，借口战时紧缩，大量压缩编制，裁减人员和经费，把原先3个处9个科压缩成了4个科，裁撤处一级。4个科的分工是：一科掌文字宣传，科长杜国庠；二科掌艺术宣传，科长洪深；三科掌对敌宣传和国际宣传，科长冯乃超；四科掌印刷、出版、发行和总务，科长何公敢；厅长办公

室主任秘书仍由阳翰笙担任。分城、乡两处办公，城办设在两路口丘上一个中学的原址，与政治部本部一起办公，主要是第四科的人员；乡办设在市郊歌乐山金刚坡下的三塘院子，集中了一、二、三科绝大部分人员。郭沫若、阳翰笙因对外活动多，基本驻城办；乡办由杜国庠担任代理厅长。1940年秋第三厅被迫改组，郭沫若被调离，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与郭同进退，集体辞职。第三厅到了重庆后的一年零9个月中，在国民党顽固派压迫、箝制的困难环境下，郭沫若领导大家开展不懈的斗争，编印了大量宣传书刊和资料。1939年担任印刷、出版、发行工作的有邢逸梅、何岭龄、徐志刚、李野萍等，但1940年印刷发行工作就被政治部总务厅抓了过去，目的也是为了约束第三厅的工作。在重庆编写的宣传品中，除告日文告（用政治部名义）、每周宣传要点、重点宣传提纲以及传单标语口号外，印制出版的重要宣传书刊有下列各种：

（一）《抗战小丛书》，第一科编印。丛书的编写计划是根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二书对抗日战争全过程形势的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提出的任务与要求拟订的。除阐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必要性，分析国内外形势、阐述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的任务等外，不少选题是揭露日寇的暴行，描述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痛苦与惨状，斥责汉奸卖国贼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颂扬英勇杀敌慷慨报国的英雄业绩等等。最初计划编180种，后计划在执行中改变修订。因厅里人员可根据计划分配任务撰写，但外稿除少数作者根据计划选题撰写外，很大部分只能根据总体要求和规范来撰写。当年为《抗战小丛书》写过稿的厅外作家有老舍、华岗、胡绳、罗森、叶以群、欧阳山、草明、徐盈、彭子冈、曾克、黑丁、老向等，厅内人员有潘念之、何成湘、蔡馥生、尚钺、徐步、力扬、刘明凡、万迪鹤、石啸冲、陈

乃昌、钱远铎、李拓之、翁植耘等。这种小丛书，一般都用通俗的笔调写，短小精悍，字数一般为五六千，不超过一万，每册印数约5万至10万册，前后一共大概编写印行了100种左右。主要分发到前线及敌后士兵手中。

(二) 年鉴型的《抗战二年》和《抗战三年》(《抗战一年》在武汉编印)，其内容包括当年的世界形势，中国抗战形势，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各方面情况和资料的汇集与总结，以及大事日志等，为16开本，字数约80万到120万。分发给重庆及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在地的机关图书馆和研究部门参考。顺便提一提，郭沫若调离第三厅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后，由国民党派何浩若任该厅厅长(一年后又派黄少谷为厅长)，《抗战四年》仍继续编印出版，而且还来约郭老写稿。郭老叫笔者代写了一篇《四年来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送去发表，文中还宣传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观点。郭老当年在重庆发表的文章，99%以上均亲自执笔，仅偶尔叫何成湘或笔者代写，后来他编文集时就不辑入。

(三)《抗战文艺》和《抗战壁报》，是第二科编绘的出版物。前者以街头活报剧、诗歌、救亡歌曲以及说唱、顺口溜等通俗文艺为主，后者以宣传画、漫画、木刻、连环画等为主，定期每月及每半月出版。分发到各战区各级军、师政治部、转发到营、连政工干部，作为他们宣传的素材。

(四)《敌情研究》和《日台广播资料》，第三科编写出版。《敌情研究》为32开本，铅印，每月出版二册，每期约五六万字。主要编写人有蔡仪、于瑞熹、燕绮瑄、王学膺、史殿昭等，均为留日回国学生，他们根据《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改造》、

《中央公论》等所载文章和资料，加以分析研究，编辑而成。出版后分送陪都及各战区有关机关和研究部门参考，其中一部分还通过中共驻渝办事处运送到延安分赠有关部门。这个刊物当年具有较大权威性，获得好评，受到重视。《日台广播资料》是收录日本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和评论编印的，每天油印出版，特点是及时，分赠有关机关单位参考。

（五）《中国报导》（Heroldo de cinio），利用世界语进行抗日救亡的国际宣传刊物。每月出版一期，每期印数约七八千册，发行到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太平洋事变后，国际邮路不畅，其中一部分后来用簿纸印了航空版。参与这个刊物编写、印刷、发行工作的有叶籁士、乐嘉煊、霍应人、先锡嘉等 4 人，另外为这个刊物撰写稿件的有：绿川英子、钟宪民、许寿真、冯文洛、张闳凡等。这个刊物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情况，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摘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几期刊出；同时也摘译了一些蒋介石及其下属将领主张抗日和斥责投降的言论。由于世界语书刊无处承印，于是第三厅专门建立一个世界语排字房和日文排字房，专门排印世界语宣传书刊，和供应运到前线日军阵地上散发的日文传单和歌曲通行证等。世界语在全世界没有普及，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各地懂世界语的人往往是热情、富有正义感、关心人类进步事业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国报导》上的文章，常有被转译成其他各国的文字，刊登在其本国的报刊上，起到了积极广泛的宣传效果。当年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工会）所属的世界语排字房，除排印《中国报导》外，还排印出版了《郭沫若先生及其文学作品》、《归来》、《新时期》、《新生活》、《中国战时木刻》、《中国抗战歌选》等世界语图书。

（六）《日寇暴行实录》，是一本真实的照片集。搜集编辑于武

汉，带到香港印刷，系16开本，分精装和平装两种，印数很大，印好时武汉已弃守，所以是从香港经桂林运送到重庆才发行的。这是一本最雄辩地揭露日寇残暴兽行的记录，全部照片除我国和外国新闻记者实地拍摄外，很大一部分得自战场上的日本兵尸体。如一个凶残的日本兵，一手握着一柄马刀，一手提着他刚砍下的一颗中国人头狞笑，旁边横放着一具无首的我国同胞的尸体。又如一群呲牙咧嘴的兽兵围着一个被他们剥去衣裤的中国女人淫笑。至于大火焚烧排排民房，无数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在河中漂流的照片，则更是数不胜数。这本名副其实的《实录》，确实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极富教育意义。全书分烧、杀、抢、奸、轰炸、流徙等几个门类。当年这本书也有一部分发行到海外。我保存了一本，记得在新中国成立后，当抗日战争胜利10周年之际，曾把这本《实录》拆开，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展览。

这里还应提一提在武汉建立的“战地文化服务处”，这是第三厅编写出版宣传书刊的发行机构，并先后在长沙、宜昌、上饶、西安四地设立了“服务总站”，每个总站又在各省许多县城分设了“战地文化服务站”，还与生活、新知、读书等书店建立联系，形成了一个进步书刊发行网。到了重庆之后，第三厅掌握了利用武汉群众的献金到香港购来的10辆大卡车，工作更加活跃了。国民党顽固派对第三厅本来一直采取歧视、压迫、箝制的方针，开始他们对“战地文化服务处”没有注意，后来发觉了，决心取缔，便借口什么“战地文化服务处已为异党分子所操纵”。任意迫害和逮捕服务处、站的工作人员，以至封闭了各地“服务站”，最后把第三厅的手脚——“战地文化服务处”整个砍掉了。

二、主持文工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11月1日，7日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招待会，才正式宣布已经成立，而具体筹备工作则在9月开始，10月份开展正常工作。到1945年4月1日被迫解散，一共在重庆仅存在了4年又6个月。文工会不像第三厅那样为行政机关，仅是一个研究机构。这是蒋介石在文工会筹组时就定下的框框。郭沫若本不愿主持这一机构，周恩来劝导说：“蒋介石怕你们跑到延安去，划了这个框框把你们圈起来，你们可以跳出圈子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因此，郭老就任文工会主任委员，并且没有听从蒋介石“只许做研究工作，不许从事对外政治活动”的禁令，一开始便走向社会继续开展活动与斗争了。文工会还设有两个副主任委员，一个是阳翰笙；另一个是国民党派来监视郭沫若和文工会活动的谢仁钊，此人就任后因陷于孤立，不久便辞职了。续派李侠公来继任，李与郭在北伐时代就认识，他到任的第一天就把“上面”叫他监视郭沫若的密令向郭老出示，两人相视大笑，后一直合作得相当好。

文工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张铁生，未到位，由蔡馥生代理。第二组，艺术研究组，组长田汉兼任；田汉至桂林后，由石凌鹤代理。第三组，敌情研究组，组长冯乃超。三个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跟随郭沫若从第三厅退出来的人员；也有少数在武汉时参加过第三厅，一度暂离又回来参加文工会的，如光未然、贺绿汀等；再有少数是新吸收的，如臧云远、柳倩、王亚平、王朝闻、朱海观、高植等。在三个组以外，文工会还聘任了10名专任委员和10名兼任委员，他们是茅盾、老舍、陶

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蓬子、吕霞光、刀伯休。阵容很强，都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作家、戏剧家和文艺评论家，还有自然科学家和画家。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角度看，范围比武汉时代的第三厅更扩大了。文工会经常举行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内容包括国际形势、国内时事、历史研究、文艺戏剧研究、日本问题探讨等。有的用讲座形式进行，一个专题举办多次。这类活动，郭沫若总是带头，文工会的委员轮流担任讲述或座谈，也曾多次请冯玉祥先生来讲演，还请国民党中不属于顽固派的人参加。这些活动在文工会初建阶段搞得相当热烈，很受陪都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文工会初建时，曾筹划过创办一个大型的《文化月刊》。因那时延安创办了《中国文化》一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重庆如再出一个《文化月刊》，可收南北呼应之效。这个刊物以文工会全体委员为编委，郭老任编委会主任，张志让为主编，我被指定为编委会秘书。不幸筹备工作开始不久，皖南事变发生，张志让、杜国庠等暂离重庆，同时文工会的经费预算被国民党当局压得很紧，出版刊物的经费也无着落，因此这个《文化月刊》没有问世便流产了。

当时文工会内编辑出版的刊物，除了从三厅延续下来的两种铅印刊物，第一组的《中国报导》和第二组的《敌情研究》，一种油印的《日台广播资料》外，新办的只有第一组编印的《国际问题资料》，不定期，每月出二三期，因占有资料丰富，很受研究单位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另外就是为《新蜀报》和《扫荡报》编辑的《国际问题》周刊和《七天文艺》了。

皖南事变后，重庆一片白色恐怖。文工会根据中共党组织指

示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疏散了一部分干部。留下来的则在周恩来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号召下，积极开展了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文工会的对外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被迫趋于停业；但过不多久又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理论斗争和以戏剧为武器的斗争。郭沫若率先带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创作历史剧，同时他又在文工会内部提出“扎实研究、艰苦创作”的口号；举办学术讲座和文艺讲座，不仅他自己主讲，也请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主讲，把学术研究的气氛搞得浓浓的。在这一时期中，文工会的委员和组员撰写出版了不少著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有：邓初民出版了《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苏联历史学界论争解答》；杜国庠出版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和《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并同侯外庐、纪玄冰合写了《中国思想通史》；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卢于道编写了《科学与民族复兴》；沈志远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大纲》；蔡仪出版了《新美学》；王昆仑出版了《红楼梦人物论》……。在文艺作品方面有：阳翰笙创作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四部话剧剧本和《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日本间谍》三部电影剧本；田汉创作的话剧《秋声赋》和戏曲《新雁门关》、《江汉渔歌》、《会缘桥》、《双忠记》；洪深创作的剧本《飞将军》、《女人女人》、《鸡鸣早看天》、《黄白丹青》；茅盾创作的小说《腐蚀》、剧本《清明前后》；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诗集《剑北集》，剧本《残雾》和《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面子问题》等；石凌鹤出版了《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战斗的女性》和《山城夜曲》；臧云远、李嘉、陈定合写了歌剧《秋子》，臧还与王云阶、吴晓邦合写了《法西斯的